

## 《欧洲梦》序言

[美] 杰利米·里夫金

杨治宜 译

上世纪 60 年代,我曾经是个激进分子。与许多同辈一样,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到一场社会剧变之中。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,非裔美国人要求坐在公交车前排的权利;在芝加哥,他们高举拳头上街游行,唱着“黑色的力量”。美国男孩被装在裹尸袋里从越南重返故土,开始不过点滴,后来竟成浪潮。大学生呼吁中止美国在东南亚的非正义战争,为此他们在大学行政办公室区筑起了街垒,抗议非民主的教育系统——在校方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议时,他们却被剥夺了发出声音、投票表决的权利。

空气里充满了解放的气味。你都能闻到它。年轻人厌倦了核弹空袭演习,冷战,穿灰色法兰绒制服的男人,以及束缚心智、一成不变的美国郊区生活,他们到处都在反叛。言论自由、性解放、摇滚乐、大麻、“和平与爱情”(flower power),它们席卷全国,进入到每一个美国的小镇和城市。反叛的形式在不断变换:有时候你都很难跟上形势,甚至难以坚持下去。阶级政治让位于文化政治,然后是性别政治,最后是生态政治。墙上贴满了切·格瓦拉(Che Guevara)和休伊·牛顿(Huey Newton)的海报;然后它们被取了下来,换成披头士(the Beatles)和滚石(Rolling Stones);然后它们再度被取而代之,贴上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。

老左翼让位给新左翼。历史意识、关于辩证法、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抽象探讨开始发现自己和“治疗学意识”(therapeutic consciousness)之间缺乏共鸣。年轻人不再引用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或毛泽东的红宝书,而是开始喜欢分享他们最隐秘的情感,谈论他们人际关系的动力源泉,正如政治变成了集体治疗一样。对政治解放的讨论让位给对个人精神修炼的探索。到 70 年代初期,一切都在